

《新疆图志·军制志》舛误举证

史国强

提 要:《新疆图志·军制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新疆历代兵制演变的志书,然而讹误甚多,本文针对其中出现的人名、地名、时间、官职、数字及叙述的讹误进行了考证。讹误的造成主要与《新疆图志》的编纂组织形式及印刷过程的排印、校对不精有关。

关键词:《新疆图志·军制志》 编纂 舛误

《新疆图志》是清末由新疆通志局主持修纂的一部较为完备的大型地方通志。其中的《军制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新疆历代兵制演变的志书,其究大辂之始,考因革之轨,对自汉代以还历代守护西域军队的官员名称、职掌、设立时间及兵额数量,尤其是对清朝自乾隆至光绪之末新疆兵制所经历的三次重大变革记载详赅,对于研究新疆地方历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同时,该志对古代边地军队建设及固圉绥边大略成败得失的考究,对于今日制定筹边要策,趋利避害,推动国防建设,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然而,《军制志》讹误甚多,而梳理清以前历代西域军制的《军制志一》尤为集中。笔者以1923年东方学会重校铅印本为底本(据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12月影印本),以宣统三年(1911年)新疆官书局活字本为校勘本,对《新疆图志·军制志》进行了整理校勘,对其所征引之典籍,亦据善本参校。现就笔者整理中所见舛误作以考订,以期有助于研究者。

一 人名讹误

《新疆图志·军制志一》记述新疆历代兵制的演变,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除少数避清代讳的人名外,如桑弘羊(底本作“桑宏羊”)、王弘(底本作“王宏”),尚有多处错讹者。

1. (梁) 儵:《新疆图志》第1752页(下文书名从略)第三行“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禧、博、儵及伊吾庐、柳中屯田吏卒而还”,据《后汉书·班梁列传》,“儵”应为“懂”,为西域副校尉梁懂名字之省写。

2. 班索:第1752页第六行“永宁元年,北匈奴率车师后王军杀后部司马及班索等”,据《后汉书·西域传》,“班索”应为汉行长史“索班”。

3. 后部玉阿罗多:第1755页第一行“桓帝永兴初,后部玉阿罗多又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据《后汉书·西域传》“后部玉阿罗多”应为车师“后部王阿罗多”。

4. 唐休璟:第1758页第一行“长寿初,唐休璟收复四镇”,《旧唐书·吐蕃传》云:“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又,《资治通鉴》卷二〇五“长寿元年”:“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左卫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据此,唐休璟仅为奏议者,而无收复之功,故应为“王孝杰收复四镇”。

5. 李嗣业:第1760页第十二、十三行“李嗣业为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军”,《旧唐书·李嗣业传》“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旧唐书·马璘传》“永泰初拜四镇行营节度兼南道

和蕃使……俄迁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及邠宁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据改，“节度军”为“节度使”之讹。

6. 阿而忒的斤：第1761页第五行“辉和尔国主阿而忒的斤”，据《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应为“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之误。

7. 白阿儿忻：第1763页第八行夹注“永乐十一年，都指挥白阿儿忻遣使来贡”，《明史·西域传》“白阿儿忻”为“白阿儿忻台”。

8. 徐学功：第1780页第七行“曾著战绩如徐学功辈”，据《新疆图志·兵事志》，当为“徐学功”之误。

二 时间之误

《新疆图志·军制志一》追述军制发展历程，所涉时间亦有与史书悖谬者，兹胪列如下：

1. 第1751页第十二行“六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后汉书·西域传》：“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六年，班超复击败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故“六年”当为“三年”之讹。

2. 第1754页第十四行“杨嘉以后”，《后汉书·西域传》作“阳嘉以后”。

3. 第1757页第五行“至显庆二年，杨胄讨平龟兹，置龟兹都督府，复移安西都护治焉。以旧安西为西州都护府，镇高昌故也”，据《新唐书·高宗本纪》云：“（显庆）三年正月戊申，杨胄及龟兹羯猎颠战于泥师域，败之。”又，《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三年”：“左屯卫大将军杨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镇高昌故地。”故“显庆二年”当为“显庆三年”。另外，“故也”为“故地”之误。

4. 第1759页第九行“长安三年，复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二年……十二月……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底本“长安三年”当为“长安二年”之误。

5. 第1761页第九行“至元十二年，遣兵千人戍畏吾境”，《元史》至元二十三年十月有此记载，疑著录错误。

6. 第1761页第十四行“（至元）二十三年……又置火州、曲先元帅府”，《元史·世宗本纪》至元二十三年未有设立火州、曲先元帅府的记载。《元史·成宗本纪》：“（元贞元年）立曲先塔林督元帅府。”此处或有误。

7. 第1762页第十二行“永乐十八年，脱脱卒”，据《明史·西域传》：“（永乐）八年十一月，遣官赐敕戒谕之。未至，而脱脱以暴疾卒。”故“永乐十八年”当为“永乐八年”之误。

三 地名之异

《新疆图志·军制志》述及相关地名，除去音译异写，仍有数处讹误：

1. 析枝：第1749页第二行，据《汉书·西域传》当为“捷枝”之误写。

2. 扞采：第1749页第九行，据《汉书·西域传》当为“杆弥”之误写。

3. 蒲犁后国：第1750页第十行夹注，据《汉书·西域传》、活字本当为“蒲类后国”之误写。

4. 伊吾庐：该地名出现多处，而据《后汉书·西域传》当为“伊吾卢”。

5. 大漠、元池三都督府：第1757页第十行，据《新唐书·吐蕃传》当为“阴山、大漠、玄池三都督府”。

6. 吉崆斯喀什：第1768页第七行夹注，活字本作“崆吉斯喀什”。

7. 乌鲁克恪提：第 1810 页第四行夹注，活字本、《西域地名考录》作“乌鲁克恰提”。

四 官职讹误

1. 参事军：第 1759 页第十行，据《通典》卷三十二当为“参军事”之误。
 2. 达噜噶齐：第 1761 页第七行“十八年，始定西域，置达噜噶齐监治”，《元史·太祖本纪》：“十八年……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监治之。”“达噜噶齐”为“达鲁花赤”音译另写。
 3. 忠顺王：第 1762 页第十行“以周安为忠顺王”，据《明史·西域传·哈密卫》：“（永乐二年）六月（安克帖木儿）复贡，请封，乃封为忠顺王，赐金印……四年……三月立哈密卫……又以周安为忠顺王长史”，故“忠顺王”为“忠顺王长史”之误。
 4. 蓝领：第 1766 页第七行夹注“内空蓝领八人”，据上下文当为“蓝翎”之误。
 5. 饶骑校：第 1766 页第十四行“饶骑校十六”，据活字本当为“骁骑校”之误。
 6. 安西将军：第 1770 页第四行夹注“乾隆三十七年安西将军奏准”，清朝无安西将军一职，活字本作“西安将军”，据《清实录·高宗实录》卷 921 页 12 上—14 上，上此奏章者为西安将军福僧阿。
 7. 部司：第 1771 页第三行“右营部司一”，清朝军制中无“部司”职衔，据活字本及上下文应作“都司”。
 8. 领协：第 1775 页第一行“领协之官一”，据活字本及上下文应作“协领”。
 9. 巴总：第 1777 页第十四行“巴总四”，据活字本及上下文应作“把总”。
- 另外，还有两处军队名称错误者。
1. 古古军：第 1761 页第十行“古古军”，据《元史·世宗本纪》为“蒙古军”之误。
 2. 老湘：第 1801 页第十行夹注“老湘中旗”，据上文“老湘”应为“老湘军”。

五 数字之讹

1. 鄯善国“胜兵二千九百十人”：第 1750 页第七行夹注。《汉书·西域传》：“鄯善国……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
2. 上策：第 1754 页第六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瑄上书陈上策”。《后汉书·西域传》：“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瑄上书陈三策。”“上”当为“三”之误。
3. 判官一人：第 1759 页第十三行夹注“判官一人”，《旧唐书·职官志》、《通典》卷三十二均载唐代节度使下辖“判官二人”。“一”当为误录。
4. 二万八千人：第 1760 页第二、三行“北庭节度使……有兵二万八千人，马五千匹”。据《旧唐书·地理志》：“自永徽至天宝，北庭节度使管镇兵二万人，马五千匹”，“二万八千人”应为“二万人”之讹。
5. “瀚海军……管兵七千五百人，马二千四百匹”：第 1760 页第四行夹注。《旧唐书·地理志》载：“瀚海军，在北庭府城内，管兵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河西节度使……大斗军……管兵七千五百人，马二千四百匹”，据此，底本误将河西节度使大斗军兵马数量著录为瀚海军兵马数量。
6. 步队二一营：第 1789 页第四至五行。活字本作“步队一营”，据下文总计之“步队九营”，此处应为“步队二营”。

六 叙述讹异

《新疆图志·军制志》叙述文字由于校对不精,也出现了多处讹误,致使文义不通,甚或悖谬者:

1. 由伊循以镇抚之:第1750页第一行。《汉书·西域传》作“田伊循以填抚之”。“由”为“田”之误,“镇”为“填”之异写。

2. 王剑:第1751页第十一行“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王剑羽盖”,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当为“赐玉剑羽盖”。

3. 曹宗乘间请匈奴匈奴:第1752页第六行。据《后汉书·西域传》,当为“曹宗乘间请出兵击匈奴”。

4. 王诛再加:第1755页第九行“加之不礼大国,遂使王诛再加”,《旧唐书·西戎》为“遂使王诛载加”。

5. 行人万里过之多死:第1756页第六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贞观十六年”作“行人往来遇之多死”。

6. 不利于中国:第1756页第十三行“惟吐蕃与墨噉受命,是将不利于中国”,《旧唐书·郭元振传》:“墨噉受命,是将大利于中国也”,“不”为“大”之误。

7. “如钦陵云‘四镇诸部与蕃接界,惧汉’,密近兰鄯,北为汉患”:第1759页第四、五行。此句抽省不当,著录错讹,文义费解。此句源出《旧唐书·郭元振传》,云:“如钦陵云‘四镇诸部接界,惧汉侵窃,故有是请’,此则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比为汉患,实在兹辈,是亦国家之所要者。”底本脱“青海、吐浑”,“北”为“比”之误。

8. 兰城守捉八:第1759页第十四行。据《新唐书·兵志》当为“兰城等守捉八”。

9. “北庭节度使……建康军(张掖郡西二百里,嗣圣初王孝杰置,营兵五千四百人,马五百匹)、宁寇军(张掖郡东北千余里,天宝二年置,管兵千七百人,马百匹)、玉门军(酒泉郡西二百余里,武德中杨恭义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马六百匹)、墨离军(晋昌郡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豆庐军(敦煌郡城内,管兵四千三百人,马四百匹)、新泉军(会宁郡西北三百里,管兵千人)、张掖郡守捉(管兵六千三百人)、乌城守捉(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武威郡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武威郡西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沙钵守捉(亦曰莫贺城,在北庭之西五百余里,西、伊二州之境皆属焉)”:第1760页第三至八行。据《旧唐书·地理志》,此处误将河西节度使所辖各军兵马数量著录在北庭节度使之下,而脱录了本属于北庭节度使的“天山军(在西州城内,管兵五千人,马五百匹)、伊吾军(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马三百匹)”等内容。此误源出于《四库全书·通典》,本系钞胥误录,而军制作者抄录亦未加详辨,故致讹误。

10. 据议:第1793页第十行“未能据议裁革”,据上下文义及活字本,当为“未能遽议裁革”。

11. 臣重在忝权:第1817页第五行夹注。据上下文义及活字本,当为“臣重任忝权”。

12. 不合:第1823页第一行“新省将弁虽不合材武之士”,据上下文义及活字本“不合”为“不乏”之误。

13. 讲习新操者盖少:第1823页第二行。据上下文义及活字本,此处夺“少”字,应为“讲习新操者盖少”。

总之,《新疆图志·军制志》众多讹误的出现是与《新疆图志》的编纂组织形式分不开的。其凡例称“是书分类较繁,则分纂诸家甚众,而服官于此者复居多数;有初稿甫定,即行奉檄他出者;有甫成半稿,经后贤接续者;有一志数门,分员编纂者”。这种修纂人员的频繁流动当是导致典籍引述的大量错讹产生的主因(《军制志》作者今日尚无从考证)。此外编纂的仓促,排印、校对的不精也是与此相关的因素。如上文所述,即令是对活字本作过校勘订误的东方学会重校铅印本亦有不少新的排印错误。诸如此类,皆当为今后研究者所应关注。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2.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3.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6.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7. (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8. (清)袁大化、王树枏等:《新疆图志》,新疆大学图书馆藏,新疆官书局 1911 年版。
9. (清)袁大化、王树枏等:《新疆图志》,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5 年版。
10.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11. 《清实录·高宗实录》,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12. 钟兴麒:《西域地名考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

(联系方式: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医路 393 号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邮编:830011)

本文责编:杨海峰

上海市地方志系统机构负责人会议召开

2011 年 1 月 12 日下午,上海市地方志系统机构负责人会议召开。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刘建,副书记、副主任朱敏彦,副主任莫建备和全市地方志系统 38 家机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建主持。

会上,刘建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振武同志 2010 年 11 月 11 日在市方志办全体干部会议上对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提出的三点要求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同志最近关于上海地方志工作的讲话精神。朱敏彦代表市方志办对 2010 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部署 2011 年全市地方志工作;莫建备就上海市地方志系统“十二五”规划草案起草情况作说明。7 家机构的代表在会上围绕 2011 年全市地方志工作和上海市地方志系统“十二五”规划草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刘建在听取发言后表示,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方志办一定会认真加以研究,同时,继续听取各有关方面的意见,使 2011 年全市地方志工作要点和地方志“十二五”规划更科学合理,更具操作性。最后,刘建强调,2011 年地方志工作中,启动《上海世博会志》的编纂工作和地方志“宣传周”活动很重要,全市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上下齐心,联动做好工作,共同推进全市地方志工作的开展。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times, looking for value and room for improvement of quality in local records starting from China's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exploring new development paths for local records through learning from Western historiography concepts and methods, paying attention to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local information, and deepening analysis and grasp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age.

Local Records Should be People—oriented in Accounts of Social and Humanistic Contents **Chen Manping** (23)

In compiling second—round local records,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official accounts” and people—oriented accounts given overall considerations and proper balance. Local records should not only register political performances and achievement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fficials and save historical records for various causes, it should also be people—oriented and emphasizing reflecting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Local records should balance the group images and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of accounted personalities as a whole,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ssroots and elites given overall considerations and proper balance,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people given overall promine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public authority and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perly dealt wit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rotect the opposite parties of public authority that have been recorded in local records, especially the personal integrity and lawful rights of the weak and relative weak parties, with sensitive issues linked with human rights cautiously dealt with.

Reflections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Quality of Second—Round Local Records **Liu Qiqui** (28)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local records compiled during the second round, not only in content framework, style, and structure, but also in the selection and usage of reference materials. During the second—round compilation, local records compiled by certain work units are churned out roughly, hastily, and irresponsibly; certain local records workers flaunt the banner of innovation and put into practice so—called “new creation”. The local records community should overcome the unhealthy tendencies of being impatient and fashion—chasing, and make hard efforts in compiling local records in a painstaking, patient, and quiet manner. Those local records units that have already enjoyed pay and benefits equivalent to officials in civil services must realize that local records units are local records academic research units having certain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must be taken as the first priority and the main target, with the emphasis firmly put on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and local records academic theories studies. Local records units should not become administrative units.

ReflExploring the Road Betwee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County Records **Tan Ge** (36)

Evidences of Errors in “Xinjiang Graphical Records — Military System Records” **Shi Guoqiang** (37)

“Xinjiang Graphical Records - Military System Records” is a book specially dedicated to recording the evolution of Xinjiang military system over the various dynasties, yet with a large number of errors. This article provides textual criticisms on errors concerning names of people, names of places, time, title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numbers and narrations. The errors were mainly caused by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compiling team and unprofessional proofreading and typesetting during printing process.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Shunzhi and Kangxi Editions of “Yanpingfu Records” of Qing Dynasty **Luojian, Liu Zubi** (42)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ontent and article structure of Shunzhi and Kangxi editions of “Yanpingfu Records” of Qing Dynasty, we can see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content, engraving and printing, original texts and supplemented texts. Therefore it is not hard to see that the Shunzhi edition of “Yanpingfu Records” of Qing Dynasty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old local records with important reg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